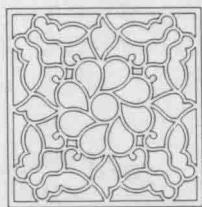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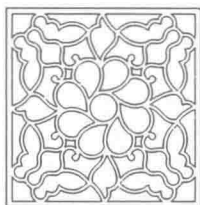
苏州文史研究

陆允昌 著



苏州文史研究

陆允昌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州文史研究 / 陆允昌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496-1534-6

I. ①苏… II. ①陆… III. ①文史—研究—苏州市
IV. ①K2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4409号

苏州文史研究

著作权人 / 陆允昌
责任编辑 / 李 蓓
装帧设计 / 刘 啸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印刷装订 / 苏州华美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300千

印 张 / 25.75

ISBN 978-7-5496-1534-6

定 价 / 65.00元

弁 言

二十四年前，我年达六旬，按规定办理了退休手续，心想从此可以好好地利用余生，读读书，动动脑，长长知识，以此养生，何乐而不为。

长期以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看书、读书有了一点心得体会，发现了一些新的资料，便急着把它记下来，日积月累，逐步整理成文。如今学会了电脑，有了复印机，就更加方便，更加快捷了。1983年到2013年的三十年间，编撰出版了《对外经贸常识》、《苏州洋关史料》、《苏州对外经济志》（主笔）、《涉外经济工作基本程序》（主编）、《中国孙氏世系源流》（主编）、《涉外经济政策指南》（主编）、《孙武研究新探》、《苏州海关志》（特邀编辑）、《近代苏州通商口岸史料集成》、《孙武研究再探》等书籍共十四种，其中半数是在退休以后完成的，使我“退而不休”的后期人生，活得更充实，更有滋有味。

我是江苏太仓人。父母生于清末甲午战争前。青年时，他们分别就读于“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习称“金陵女师”，今南京师范学院前身），毕业后在家乡长期从事教书育人的职业。我从小到大，父母亲多有启蒙和鞭策。1948年底，我患了一场大病，后来才知道是“血吸虫病”引起的，不得不辍学在家养病。父亲不仅隔三差五辅导我补习英文，还安排我每周两次去钱星揆老伯家补习，由这位做过教

育局局长的长辈一字一句教授《论语》、《孟子》的一些篇章。背诵古文，实在是一桩“苦差事”，有时反倒打不起精神来。见此情况，叔父给我送来他珍藏的《三国演义》、《封神榜》之类的历史小说，让我排忧解难，长了知识。半年左右，身体才完全好起来。如今我能有一点收获和成绩，也是对父母和长辈对我当年教育的一种回报。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国民党南京政府迅速瓦解。月底，家乡解放。1950年初，我进了中共太仓县委举办的第三期“青年训练班”。受训结束，被部队选中，穿上军装，戴上镶有“八一”军徽的军帽，从此成了一名革命军人，迎来了崭新的生活。从军十四年，我没有辜负部队首长以及战友们的期望，先后荣立“三等功”四次，并入了党。1963年初，根据中央关于抽调十万军队干部支援地方建设（时称“支商”）的决定，我离开了培养我成长的“革命大熔炉”，转业从事商业工作。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四十二年中，我尽职尽责地做好本职工作和分派的任务。平时少有其他兴趣，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做一些浅显的研究。

时光流逝，而今虚龄已八十有五矣！生活安定，家庭美满，自然是夕阳如画，颐养天年。去年春天，稍有空闲，从一只只纸箱中拣出那些积存已久的书稿和材料，觉得这些零星篇什以及觅得的大量资料，还有利用和进一步研究的价值，读之尚有余味，弃之颇为可惜，于是敝帚自珍，着手分类整理，打算继2005年编成《孙武研究著论汇辑》（六册）后，再装订成册，作为重温故文的一种自娱。

一天，一位知心朋友来家小叙，谈起此事。他建议我不妨从已经发表过的文章中挑选一些，再补充几篇，出一本新的集子，作为收官之作，以书为媒，以书会友。我感到这确是一个好的建议，于是花了足足一年时间，一共选出三十一篇（其中补写了三篇）文章，又一一作了仔细推敲，字斟句酌，

多遍修改，为的是减少错谬，以免贻误读者乃至后生学子。

收入书中的这些文章，内容各别，长短不一，文笔风格亦不尽一致，可谓兼收并蓄，良莠互存。无论是研究“对外经济”、“地方史志”，还是研究“中外交涉”、“历史人物”，都与我的第二故乡苏州搭界，故把书名定为《苏州文史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非是学术界的专业人士，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历史爱好者，出版此书的初衷是想和读者们分享我阅读的喜悦和写作的体会。我自知自己并非文无加点之才，下的无非是笨功夫，几十年来得到的最大心得就是：研究历史一定要注重资料的搜集，并对得来的资料做一番认真仔细的鉴别，寻根究源，慎于思考，去伪存真，择善而从，这不仅是立言之本，也是立身之本。为了搜集资料，我曾奔走于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安徽、山西、河北、山东、福建等地，从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和民间私人处，看古籍，找资料，觅谱牒，数年下来，收获颇丰。对于写作，我一向持谨慎态度，自知来不得半点马虎。回首自己的人生经历，感悟出这样一条“规矩”，就是：做学问一定要脚踏实地，不能捕风捉影，要抱有“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对后人负责”（也就是“文责自负”）的原则，力求写的文章能够符合“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要求，不唯上，不护短，不偏袒，实事求是，服从真理，做到问心无愧，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还需要说明的是，书中收入研究孙武其人其事的文章占了很大比重，原因是退休以前的四十二年间，一直忙于工作，无缘“兵学”，退休以后，经曾共事多年的老战友谢国良同志点拨，1994年才开始涉足“孙子学”研究领域，投入的精力最多，花费的时间最长。这些年来，完全是从“一张白纸”起步。除了一度应原单位领导及苏州海关邀请，费了几年时间，协助编纂出版《苏州对外经济五十年》和《苏州海关志》外，其余时间几乎都投入了孙

武研究。我通过对国内兵学界、文史界人士围绕孙武其人其事研究出现激烈争议过程的了解，坚持从资料入手，对不同观点的文章，尤其是各自引用的资料，一一作了核对和比较，找出产生严重分歧的症结所在，从中汲取了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带着一些疑问和困惑，一再求教于市内外的专家学者，如陆振岳（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叶瑞宝（苏州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王汝涛（山东省历史学会顾问、临沂师院教授）、孙其海（山东省史志办副主任）、孙开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谢祥皓（山东社科院孙子研究中心主任）、赵金炎（山东广饶县政协文史委主任）、苏桂亮（辽宁省孙子学会副会长）等。他们热情地为我提供线索，指点迷津，解疑释惑，使我受到了启示，得到了教益，明辨了是非，少走了弯路。我还是那句话，有关研究孙武本事的文章不是我一个人关起门来，冥思苦想就能写就的，而是集各家之说的结果。当然，书中也有我的一己之见，只能起一些抛砖引玉的作用。

对于此书文章中所引的文献和专家学者们的著论，我依旧在注释中一一注明其来源或出处。这样做，既便于读者查询，也使我的文章增加了某种历史感，以及可比性和可读性。

《苏州文史研究》即将面世。借此机会，谨向几十年来关心并帮助我的所有新老朋友（包括国内孙氏），以及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致以诚挚的谢意。

书中纰缪偏陋之处，自知功底浅薄，有所难免，诚望国内贤达和后起之秀赐以教正！

陆允昌

2015年5月1日

目 录

弁 言

古代对外通商与设关管理研究

中国国际贸易起源与苏州对外通商.....	002
中国海关溯源与苏州设立海关.....	020

苏州外向型经济研究

《苏州对外经济五十年（1949—1999）》综述	036
苏州对外加工贸易发展状况和趋势分析	079

苏州近代海关史研究

《中国近代海关·苏州关志》总述.....	092
苏州关兼办大清苏州邮政官局.....	101
苏州关代征苏州、淞沪厘金	117

苏州中外交涉研究

苏州日本租界谈判始末	132
苏州衙门辞退“洋捕头”的一场抗争.....	153

江南巨富沈万三研究

江南巨富沈万三“生卒年时”考.....	162
沈万三“致富缘由”辨考	168

古兵家孙武研究

孙武其人其事研究叙录	180
《左传》陈武子、《世本》陈武子开、《史记》	
田武子开，即古兵家孙武子	187
孙书非陈书，也非孙武之祖	198
“孙武非孙书之孙”再考	210
孙书“伐莒”辨正	217
陈（田）恒是陈（田）乞之子，而非陈（田）乞之兄	221
孙𦣻、孙𦣻是一人，而非两人	225
孙武墓址考	231
孙武庙考辨	236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妨姓孙氏世系”校释	251
孙子故里“惠民说”科学依据质疑	263
《贞观氏族志》残卷中的“乐安”地望	287
孙逖家族墓志能否证实“孙武故里是唐朝乐安”	304
从“古厌次”六迁，考“今惠民”地望	319
从孙星衍“认祖归宗”谈封爵“乐安”	326
三国吴主孙权《玉牒·自序》考	340
孙武离齐入吴时间和动因	351
《吴越春秋》孙武“辟隐深居”说刍议	361
孙武隐居地“层累”过程述评	374
《孙子兵法》“明”于吴，而“言”于齐	391

古代对外通商与设关管理研究

中国国际贸易起源与苏州对外通商

国际贸易，泛指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然其贸易方式，古今称谓不尽相同。概而言之，有“官营”与“私营”之分。我国古代对外通商，长期受朝廷控制，1840年鸦片战争后始为“自由贸易”所取代。

中国与国外通商至今已有2400余年的历史。据《中印贸易概观》一文所述：“中国之通东洋和西洋，最早约在西历纪元前425年至前375年间（约我国战国时期），由古代巴比伦人所占之受瑟洛，以达中国东海岸之海上贸易，几全操于印度航海者之手。印人大都由麻（马）六甲海峡经苏门答腊及爪哇之南，以来中国东海岸而输入印度与波斯湾之真（珍）珠等物。”^①

迨至秦代，已有中日人员往来和通商的记载。日本古籍《应神记》、《古语拾遗》两书都载有“弓月君（融通王）率秦人移居日本”的事。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约公元814年前后），日本朝廷集诸氏系谱《新撰姓氏录》，日本学者大庭修先生据此核点，该《姓氏录》共记有1182氏，内中属中国、朝鲜族的有326氏。其中，《左京的大秦公宿弥，出自秦始皇三世孙孝武王》一节中，大庭修认为：“……在秦汉时代，中日两国不仅有物品的交流，也不仅有倭人到中国去，而且相互的往来，有秦朝、汉朝的人到日本来。”^②

又据成书于日本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日人所著《日本书记》中有关日本蚕桑起源的记载，公元前3世纪的我国秦代，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抵达日本岛国，向当地人民传授养蚕技术。

汉代，建元二年（前139）和元朔三年（前126），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③，打开了汉朝与中亚、西亚部分国家交往的陆上通道。元鼎六年（前111），武帝又采纳番阳令建议，发楼船兵十万，攻占南越国，开辟了由广东徐闻、合浦通向印度、斯里兰卡的远洋航线。从此，中国与西域和南亚各国的商货得以通行无阻。其时，中国输出的货物主要是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外国输入中国的货物有皮毛、马匹、毡毯、象牙、珊瑚、琥珀、宝石及多种植物。西汉后期，官僚经商成风，且任商贾私营。迨至东汉，朝廷对商人和商业活动采取放任和保护政策，出现“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的景象。^④《史记·货殖列传》记有：“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后汉书·西域传》记有：“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今伊拉克境内）、安息（亚洲西部古国，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献……殊方异物，四面而至。”

三国时期，江南一带为吴主孙权控制。凭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吴国建立起强大的船队，飘洋过海，“北击辽东，南航亶洲（菲律宾）、夷洲（台湾），东交倭国（日本），西航大秦（古罗马）”。黄武五年（226），“大秦商人秦伦来交趾，转往武昌见孙权，问对远西诸国情形。是年，吴大将吕岱奉命遣朱应、康泰出使海南，朱应、康泰所经历及传闻凡百数十国”^⑤。黄龙二年（230），“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亶洲。……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贸布”^⑥。嘉禾二年（233），“遣将军贺达率楼船军一万，浮海到辽东。攻珠崖、儋耳（海南岛）”。据奉命出洋的朱、康二人回国后分别撰著的《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记载：他们从广东番

禺出发，经马六甲、柬埔寨，到达印度南部红海沿岸，再从此地“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入大秦国地（古罗马帝国）”。

《南史》^⑦列传六十八“夷貊”，记自西汉武帝至三国吴主孙权近370年间的通海情形：“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江南地区商业和商业经济，由此开始名盛东南。左思《吴都赋》形容东汉时期吴郡吴县之地为“开市朝而并纳，横阡陌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仕女仁眙，商贾骈肩，纁衣帝服。……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货车巨万”。其时，苏州一带出产的吴丝、吴绫，经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到大秦（古罗马）、高丽（今朝鲜半岛）、亶州、日本等国。相传日本人民至今作为传统服饰的“和服”（古称“吴服”），其织物面料和缝制技术，就是这一时期从吴地传入日本的。

迨至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仍，海南诸国遣使来中国人贡几近中断，而南方社会稳定。黄河流域的汉族劳动民众大量南迁，使南方经济特别是太湖流域的经济表现出上升趋势，通过航海，与林邑（今越南南部）、扶南（位今柬埔寨）、天竺（古印度）、狮子国（锡兰）等十余国及日本岛国保持通商联系。其时，吴地输出货物多为绫绢丝锦，输入货物多为象牙、犀角、珠玑、琉璃、吉贝（木棉布）、香料等。南朝宋时（420—479），我国南海洋面出现“舟舶继路，商（商人）使（使官）交属（往来）”^⑧的局面。其间，日本岛国就曾多次遣使来吴，聘请能工巧匠，见于史籍的有：晋怀帝永嘉五年（311）“使于吴，求缝织女”；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使于吴”；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再奉命使吴，因得吴织、汗织并缝工女四人”。^⑨

隋代，承袭旧制，炀帝遣使裴矩说服海外诸国入朝，西域人（时称“胡商”）见有利可图，纷纷来洛阳丰都市（洛阳东市）交易。京都设“四方馆”，

“以待四方使者，各掌其方国及互市事”。随着京口（江苏镇江）至余杭（浙江杭州）的江南运河开通，苏城开始成为中外商贾南来北往、内外货品转输京师乃至海外的重要通道。

唐代，由于实行一系列新政，社会得以保持较长时期的安定状态，经济出现空前繁荣局面。唐朝对海内外通商采取更为积极进取的方针，以海上交通为重点，以丝绸制品出口为主，扩大与海外尤其是与东邻日本的文化、贸易交往。太宗时，曾在洪都（今江西南昌）造浮海大船五百艘，自东海、黄海直上日本、高丽，亦有远至红海的商船。德宗时，“中国南方海岸已有官员自造海船从事海上贸易。所造海船按载重量大小，分为五千料船、两千料船及一千料船不等。京都洛阳一时成为国际贸易货物的集散市场，城中有万余户商家来自中亚细亚及古罗马”^⑩。京城设“互市监”，在广州、泉州、明州、扬州等地设“市舶使”。《中日贸易问题的研究》一文称：“当时日本航船来华，多以明州（即今宁波）、扬州为停泊地，莱州、越州（今绍兴）、福州、苏州、楚州、台州也有日船停泊。中国航船往日，则多下碇于博多湾。贸易物品，由日本输入的多为施绵布、砂金、绢银、丝帛等；输往日本的以书籍、香料最多，米、面、衣服、药材等次之。”^⑪唐时广州一口，年到港外国商船最多时达4000艘，登陆的波斯人、天竺人、狮子国人、真腊人、河陵（阇婆国）人、昆仑（非洲）人、犹太人等商人前后有80万之众。朝廷允准在广州及京都设立蕃坊，以供居住、贸易。^⑫唐时，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物和青、白瓷器；从海外输入的商品，主要是奇异珍宝。地处长江和南北大运河交汇点的扬州和地处浙江甬江口的明州，已成为对外通商的重要港口，前来扬州、明州的大食（阿拉伯）、波斯（伊朗）、日本、高丽等国商人，常假道运河前来苏城采办货物。江浙一带的商人也常往海外贸易，“春夏时下番，秋冬时归国”。“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经济遭到破坏，北方人口再次大量南迁，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推动苏州经济日趋繁荣，逐步超过“富庶甲天下”的扬州，而成为江南地区唯一的“雄州”。诗人白

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作诗描写苏城已是“复叠江山壮，平铺井邑宽。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说明当时苏州人口已经超过扬州，坊市喧闹仅逊于京城洛阳。

宋代，内外通商更趋活跃。为充裕国库，朝廷推行鼓励海外贸易政策，在京师设立管理海外通商贸易的中央机构“榷易院”，在广州、泉州、明州设立市舶司。嗣后，又在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江阴军（今江阴市）、青龙镇（地属今上海青浦县）、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上海镇（今上海市区）和地处杭州湾的澈浦（今浙江海盐县）、临安（杭州）设立市舶司或市舶务。这些邻近苏州，与苏城水道相连的港口对外开放后，海外商舶直通苏城。当时，苏城已出现专门制作丝锦绸缎、衣帽冠带、金银首饰、胭脂花粉、箫管鼓乐的作坊和米行、丝行、果子行、鱼行、船行等商行。苏城阊门至枫桥一带行商云集，帆樯林立，店铺、茶楼、酒肆、客店、货摊比比皆是，除经销国内各地农副产品和手工制品外，还销售日本的家具、漆器，高丽的折扇，南洋的玳瑁、珠宝饰品等。北宋朱长文（苏州人，本州教谕）所著《吴郡图经续记》记有：“吴郡，东至于海，北至于江，傍青龙、福山皆海道也。……自朝家承平，总一海内，闽粤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今濒海皆有巡逻之官，所以戢盗贼、禁私鬻也。”^⑬南宋迁都临安（杭州）150余年，虽偏据一隅，然市舶寔盛，以致“国家度支以市舶所入为其大宗”。

宋时，前来苏城从事贸易活动的海外商人，以高丽人居多。南宋时，苏城阊门、盘门外运河一侧，先后建“高丽亭”两处，至今保存完好的宋代石刻《平江图》上，刻有二亭位置。据日人所著《宋代商税考》考证，“高丽亭”实为向来苏高丽商人征税之处。绍熙年间（1190—1194），苏城胥门“姑苏驿”处，又建“来远桥”，以接待往来使臣和蕃商。

元代，世祖忽必烈采取更为积极的海外政策。至元十五年（1278），诏谕：“诸蕃国列……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⑭除允许国内私人经营海外贸易外，还由朝廷官府出船、出本，资助国内舶商

出海贸易,“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⑮。其时,起于太湖、穿越苏境而过的吴淞江,江水通流,滔滔入海,海舶常溯流而上,入运河,直抵苏城。周文英《水利书》称:“元至正十四年(1354)间,海舟巨舰每自吴淞江、青龙江取道,直抵平江(苏州)城东葑门湾泊,商贩海运船户黄千户等于葑门墅里泾置立修造海船场坞,往来无阻。”说明元朝初期,由苏城循运河、入吴淞江出海的交通已相当发达。明《嘉禾志》中录有旧诗一首:“已出天地外,狂澜尚尔高。蛮商识吴路,岁入几千艘。”

元初,位于长江入海口南岸的太仓刘家港,因海流冲刷加剧,不浚自深,潮汐汹涌,可容万斛之舟,崛起成为长江三角洲的一处重要航运港口。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海盗出身、自崇明徙居太仓的朱清、张瑄^⑯开创海道漕运后,江、浙两省漕粮改用平底沙船由刘家港出海,经黄海,抵直沽(今天津),达京师(今北京)。由此,太仓成了元、明两代我国江南地区最大的漕粮转运基地和繁荣的贸易港口城市。元至正《昆山郡志》卷一《风俗》记述当时太仓海内外贸易盛况:“今新治^⑰,旧本墟落,居民鲜少,海道朱氏翦荆榛,立第宅,招徕番舶,屯聚粮艘,不数年间,凑集成市,番汉间处,闽广混居。”至正二年(1342),朝廷于今太仓市武陵桥北,设市舶分公司,管理内外海舶,征收贸易货税。明张采《太仓州志》记载:“海外诸番因得于此交通市易,是以四关居民,间阎相接,粮船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当时谓之六国码头。”海外诸番商舶由刘家港入口后,沿娄江^⑱,可直抵苏城。明张寅《太仓州志》记载:“凡海舶之市易往来者,必经刘家河,泊州之张泾关,过昆山,抵郡城之娄门。”对外通商贸易的扩大,促进了苏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以及农村集镇的崛起。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行游中国,曾到过苏州,他在回国后通过口述留下的《东方见闻》一书中,对苏州有这样一段描述:“苏州城漂亮得惊人,方圆有三十二公里。居民生产大量的生丝制成的绸缎,不仅供自己消费,使人人都穿上绸缎,而且还行销其他市场。他们之中,有些人已成为富商大贾。”^⑲更由于往诸番商贩,

率获厚利，故太仓及其周边地区一带“商者益众”。主持元代漕运的朱清、张瑄集团，就曾拥有许多私人海舶，经营海外贸易，成为吴中声势显赫的豪门富户，“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廩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舆骑塞门巷”，苏城平江路的“邾张巷”，相传为朱清、张瑄所建宅馆旧址所在。终元之世，江南一带因通番而致富者甚多：昆山周庄沈万三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因“贾海”而死的福建泉州商人陈思恭之子陈宝生，迁居太仓，与同乡人孙天富“复谋贸易于海外诸国……所涉异国，自高丽、閩婆、罗斛等国，凡十易寒暑而返……去中国数千里，足之所履无虑数十国”^②。古人形容当时太仓的“民风”为“大抵善贸易，好市利，尚虚礼”；《吴风录》一书称：“吴中好权利起家，缙绅大夫多以货殖为急。”

明代，苏州及其附近地区蚕丝和丝织品生产迅速发展。继元朝在苏城设织染局后，宋末元初传入江南松江的棉种，始时也在太仓、常熟沿岗身^③以东地区大面积种植，使苏城不仅成为江南丝织品生产的中心，同时也成为江南棉织品的加工生产地和集散地。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的二十八年间，三宝太监郑和奉旨率领由两万七千余名官兵、六十余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船队，满载瓷器、茶叶、丝绸、纴丝、铁器、农具、金银等各类货物，从刘家港（今太仓浏河口）始发，七下西洋，遍历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马来半岛、南洋群岛、印度、波斯、阿拉伯以至远达非洲东岸的今索马里、肯尼亚等三十余国，与之通好和通商。其本意在于晓谕海外各国与明王朝扩大“贡舶”和“市舶”贸易。明人王圻记明代市舶政策为：“贡舶与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贡者皆设市舶司领之，许带他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由此，“外国贡使络绎而来，番商洋贾慕刘河口之名，帆樯林立……九夷百番，进贡方物，道途相属，方舟大船，次第来舶”^④。由于从事海外贸易获利丰厚，更由于自宋、元以来沿海地区造船业的发达，故明代苏州一带出海贸易的商民甚多。吴县东山陶姓、朱姓商人，“为海贾番商之侣，紬货如帛，鬻产成廋，